1979年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拨乱反正回忆之七

□沈宝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过程中，胡耀邦发动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这场讨论从1979年10月开始，延续了一年半时间，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第1498期（1979年9月8日）刊登了蒋映光（理论部编辑）、李悦（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两位同志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意义。胡耀邦看了之后即批转给理论动态组，要求就此写一篇文章，批语全文如下：

> 转《理论动态》
>
> 这两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
>
> 胡耀邦 9.10

我们理论动态组的经济学家吴振坤承担了这一写作任务。耀邦审阅了初稿后，依据他的指示，理论动态组在9月26日和27日用两个下午讨论这篇文稿。这篇文稿以《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题，发表在《理论动态》第160期（1979年9月30日）。

这篇文章阐明，任何一个社会，生产总有一定的目的，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文章指出，从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文章说，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目前，农业技术基础薄弱，轻纺工业上不去，基本建设战线减不下来，消费品供不应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商品可供量，等等，都与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有很大关系。文章列举了为生产而生产的各种具体表现，并总结了经验教训。



耀邦审阅了初稿后，依据他的指示，理论动态组在9月26日和27日用两个下午讨论这篇文稿。这篇文稿以《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题，发表在《理论动态》第160期（1979年9月30日）。

10月20日，《人民日报》将此文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于光远《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一文。文章指出，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全部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进一步明确从什么出发来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应该以什么做标准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成绩。10月23日，《光明日报》从第一版开始，全文转载了《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提出以后，立即引起经济学界、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注意。

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首都二十多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参加会议，热烈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与会者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并建议对此深入展开讨论，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端正调整经济的指导思想。新华社于11月2日就此发了电讯稿。《人民日报》于11月3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一条新闻。

首都和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经济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个讨论，他们或开座谈会，或写文章，阐述生产目的问题。11月5日，首都八百多名技术经济工作者举行大型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讲话指出，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一个意义深远、关系到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能否顺利贯彻的重要讨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轻工业部等机关都组织有关干部进行讨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经济学会于11月6日、7日连续召开座谈会，河南省经济学会也召开了讨论会。北京、上海、辽宁、四川、天津、广东、新疆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报道了当地理论工作者、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有的还开设了专栏，讨论发展很快。

这个讨论也引起了领导干部的重视。浙江省委常委会讨论指出，搞好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二是要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都对本省如何展开讨论提出了指导意见。在各方推动下，很快形成了全国性讨论的态势。

二

这场讨论也出现了超出预想的矛盾。

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必然要讲发展生产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有一段讲了这个问题。文章说：“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先生产，后生活’。如果把它理解为生产决定消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无疑是对的。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克服困难，这个口号也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口号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机械地割裂开了，容易产生种种误解。”文章进一步说：“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只重视积累，不重视消费；只重视‘骨头’，不重视‘肉’的做法，与套用这个口号是有关系的。”文章提出：“必须生产生活一齐抓。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段话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看，都不能说有什么错，而且，还讲了特定情况下这个口号的必要性，但这一段话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处于长线的部门负责人在本部门大会上作报告抨击《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和这个讨论。有些人在本单位的报纸上对此文进行大批判式的尖锐批评。他们给我们扣上了“反××”的帽子。那个时候，这顶帽子同“反大寨”的帽子分量至少是相等。而且，对这一讨论的相反意见不只是存在于下面，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耀邦对这个讨论的进展很高兴。1979年11月5日，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篇文章，在经济界，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开窍了，当然认识还不足。他要求再写文章，将讨论引向深入。吴振坤又撰写了一篇《再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2月3日和4日，我们理论动态组连续两个半天讨论了这篇文稿，但这篇文稿写出后已不宜在《理论动态》发表。《人民日报》也暂停了讨论。

对于中止这场讨论，《人民日报》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给耀邦写信申述自己的意见。耀邦找他们谈话作解释。据说，谈话时耀邦情绪非常激动。耀邦在我们理论动态组会议上也说过，人家给我们扣上了“反××”的帽子，也没有什么。我记得，那天他的态度倒是很平静的。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只是发生在极小的范围，外界并不知晓，所以，面上的讨论还是照样进行。这个讨论适应了客观的需要，得到广大的经济学者、经济工作者和领导干部的支持，是无法阻拦的。这场讨论持续了一年半时间，其影响和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

三

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必然要求。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就要求进一步解决怎样搞经济建设的问题，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在长时期中，经济建设上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命题，抓住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一个要害问题，使大家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有了更深更切实的理解。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的实践意义是，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调整。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当时形象的说法是，“骨头”太多，“肉”太少。具体表现是：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性建设；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和农业。市场上作为消费品的商品严重短缺，人民物质和文化的最起码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这样的局面，从指导思想来说，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开启了人们的思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各部门都说自己是短线，不能压缩。什么是短线，什么是长线，这就有赖于把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弄明白。有的同志指出，只有把指导思想扭转到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上来，我们大家才能有调整的共同语言。这一讨论从基本经济规律的高度提高了大家对调整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调整。

通过讨论，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左”的思想对经济建设的最大干扰，但“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中还有许多具体表现。在讨论中，大家深入剖析了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基本统一了认识。这对整个经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发展观的讨论。当年，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为实现高指标而生产、为使领袖放心而生产、为争光而生产，等等）。近年来，某些地方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为GDP而生产、为显现政绩而生产等倾向。可见，发展观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经常注意的问题。

在理论上，这个讨论已经越出了经济的范畴，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我们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耀邦在11月5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开始时，题目是不能为生产而生产，也可以，后来再上一层楼，要认真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篇东西还是可以的。这篇文章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所要求的，而且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在讨论中，有的学者指出，经济工作如果离开了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就会丧失其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生产不仅要充分地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而且要保证他们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些，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2003年9月1—14日初稿
9月15日定稿
9月20日据吴振坤意见修改定稿
12月30日再修改

■历史档案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坚持拒腐防变的历史经验

□谢春涛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弘扬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按照共产党执政规律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早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深刻阐述了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多次告诫全党，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除了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体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解决民生和民主等问题外，始终高度关注党、政府和军队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问题。

在1929年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草案中，他把廉洁奉公写进了共产党员的五项条件，规定凡有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行为而屡戒不改者，不论是否干部一律清除出党。1933年2月，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指出：如发现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官僚主义分子，民众应立即揭发，苏维埃政府应立即惩办，决不姑息。1934年1月，他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廉政建设。1941年5月，他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了使全党同志吸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败亡的教训，毛泽东让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郭沫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领导干部作为整风文件学习。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还对依靠民主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从根本上保证政府廉洁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1945年7月，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在七大作报告

1945年7月，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他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毛泽东所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政权，是因为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坚定拥护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行动树立起来的无私清廉的形象，长期形成的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毫无疑问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方面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在国共两党的大较量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和证明。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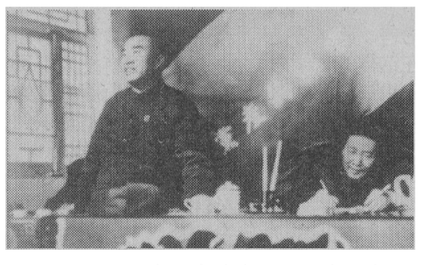
应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虽然不很容易，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要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不容易。党、政府、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很清楚，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密切联系群众意味着什么，而脱离群众又意味着什么。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则大大增加了。对此，毛泽东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告诫。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把全党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时候，形象地说这是“进京赶考”。这场考试的实质，就是要接受执政的考验，使党能够拒腐防变永不变色。对于执政党来说，经受执政的考验，是一个严峻的课题。毛泽东当年面对的是在战争年代局部执政的考验，是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考验。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党经受的是在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考验。新的形势和任务，向党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们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地提出解决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近年来，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看不到这一点是错误的；同时，应该承认，目前反腐败的任务还相当艰巨，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看不到这一点也是危险的。正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四十多年过去了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

我们需要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需要进一步破解经受执政考验这一难题。总结历史的经验，方向和出路也就在于毛泽东所说的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我们要积极探索发展党内民主、国家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办法和途径，建立和健全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有效机制，以真正保证政府不敢松懈，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朱德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实践中来

建立规范的常委会述职制度

□沈士光

所谓述职是指领导集体或领导成员个体对自己单位、部门或分管的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由其成员给予相应的评价。近年来述职广泛地运用于我国的基层的行政领域，它是确立行政责任，考量行政能力的有效手段和方法。十六届三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述职，将述职的范围推到执政党的最高层。其意义不仅是执政党加强自身政治建设的一大成果，而且也是在民主政治方面推进了一大步。

建立规范的制度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必然选择。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党委全体委员会议“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同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按照上述规定，地方党委的领导机关是党代会和全委会，这就是说地方党委必须遵守向党代会和全委会负责这一政治领导制度。因此，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述职实际上是地方党委履行自己政治责任的必要程序。

> 实行述职制度有利于发挥全委会的作用，监督常委会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有助于由原来的书记——常委会领导体制转变为党代会闭会期间全委会授权常委会主持日常党务工作，并向全委会负责的领导体制。

遵守和执行这一政治制度的意义十分重大。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批评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小平同志所批评的这种现象是正职书记领导副职书记，正副书记领导常委会，常委会领导全委会、党代会的领导结构。事实证明，上述这种领导体制和领导机构极容易形成小平同志所说的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集中在第一书记手中的弊端，造成个人专断。实行述职制度有利于发挥全委会的作用，监督常委会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有助于由原来的书记——常委会领导体制转变为党代会闭会期间全委会授权常委会主持日常党务工作，并向全委会负责的领导体制。